

孙中山与杨心如在台湾的革命情谊

林国章

一 前言

在有关孙中山先生史迹史料的众多研究论著中，曾有学者提到其四次到访台湾的说法。描述的重点除了具体确定的1900、1903、1908年等三次之外，另有一说是以1924年11月13日，当南方革命据点的情势好转之际，为了团结国人共同奋斗，应北方军阀之邀乘轮离粤北上。行程于11月15日寄留基隆港，虽然并未实质上陆，却已经算是到了台湾之地。^①

但是考察《国父年谱》、《国父全集》，有关这一趟行程的记载，列举的是“13日在陆军军官学校作最后视察，6时离黄埔，向香港航行；14日自香港开航赴上海”。^②其间并无航向台湾的记录。此外，更具佐证效力的是行程随员数据，实际上此行孙中山是偕同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而在宋庆龄传记及相关纪念图集之中，也没有陪同过境台湾的记录。^③因此，研究孙中山与台湾，应以三次到访的说法可信度较高。

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为什么到台湾？到台湾的原因是宣扬革命号召台民响应，有无其他特殊因素？再次则是，到了台湾之后与哪些人有过实际交往？做了哪些事情？

① 曾乃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幼狮文化出版，1978，第54～55页。

②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5，第1255～1257页。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7，第146～147页。另参阅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第22～23页。

二 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政管制

因为1895年5月，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及澎湖群岛割让予日本。依据该约第5条规定，在“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指台、澎地区）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在1897年3月19日，总督府对辖下官厅发出内训“台湾住民分限取籍手续”（《台湾住民身份处理办法》），其中规定：有权行使选择权的台湾住民，只限于在台湾拥有一定住所的人。但对于在台非永久住民——从大陆来的短期劳动者也给予国籍选择权。这是因为当时台湾的户籍尚未完备，很难区分永久或短期在台居留。^①

显然殖民政府是以1897年5月8日为限，逾此期限未离去者均视为日本帝国臣民，并以“本岛人”称之，以有别于真正的“日本人”。而在期限届满前申报为中国人者，或一时举家内渡中国，再于限期届满后返台未申报愿为日本臣民者，以及1895年5月8日以后始自中国大陆来台者，均被视为外国人，并以“清国人”、“支那人”称之，这在当时也俗称为“华侨”。又因为台湾割让之初，武装抗日奋起，为维护社会秩序安定，强化扫荡抗日势力，总督府对于华民入境台湾，更采取防患戒慎的态度。在1895年11月总督府发布的《清国人台湾上陆条例》中，规定来台之中国人必须持有中国政府核发载明籍贯、姓名、职业、年龄及至台目的的护照或证明书；上岸时经地方当局检查后，始发给入境许可。^②

除了户政方面的管制，日本统治台湾之初（1895年6月17日至1896年3月31日）对于社会治安以及人民权利义务的规范，完全由总督府以军令规定。1896年4月1日起施行《法律第六十三号》及《台湾总督府官制》，以军政特别法为依据，强化对殖民地警备力量与民政的统治，并设置“保良局”，由地方乡绅负责举报良民、土匪或匪徒。^③ 1897年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开始实行《三段警备制度》，将全岛治安分成军队扫荡（一

① 黄昭堂：《台湾总督府》，黄英哲译，（台）前卫出版社，1996，第65页。

② 吴文星：《日据时期在台“华侨”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第1~5页。

③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警察沿革志》第二编，《领台以后之治安状况》上卷。经王洛林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2），（台）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第253~254页。

等地——反抗、浮动的危险地区)、宪兵镇压(二等地——较少抵抗的不稳定地区)、警察守备(三等地——民情安定地区)等警备的三级防护。^① 1898年2月第四任总督兒玉源太郎开始,以恩威并济的方式实施连带责任的地方“保甲制度”,作为基层统治与联防的基础,也形成对台湾社会蜘蛛网式的渗透,这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1945年才结束。

明了这样的时空背景,有助于比较实际地贴近探索孙中山于日据时期访台及活动的可能情境。亦即在殖民政府严密的掌握之下,宣扬革命的行动困难重重,因为当时在台人士要与孙中山实质接洽并不容易。因此,更加凸显了杨心如在台协助孙中山,在国民革命史上弥足珍贵的历史意义。

三 孙中山到台湾的历史及交往关系

(一) 台湾问题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关联

孙中山先生在其遗嘱中明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原因是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挟持船坚炮利的威胁之下,已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为达成救亡图存的目标,激发国人民族主义意识,发挥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国民革命必由的途径,也是晚清中国知识界共同的意向。他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陈述:

台湾、澎湖,这些地方是因为日清之战,才割到日本。中国因为日清一战,才引出列强要瓜分的论调。^②

所以尽管自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已触发他立志革命的思想,但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压迫以及上书李鸿章之献策无效,才真正促使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筹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成立。

分析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的目标,重点在于“恢复中华”与“致力建设”两大方向,而民族主义力量的策动,则为达成目标的方法。他曾公开呼吁:“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③

①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台)蓬岛文化公司,1980,第279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国父全集》第一册,(台)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14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页。

兴中会在檀香山初创时即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更进一步宣示：“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①因此，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以全体国民之力量，致力于民族与国家的恢复。显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是由内发的传统因素与外激的冲击挑战所驱动，但开始号召的名目，是结合了以“族类”、“文化”与“主权”三者为重心，含有以复兴“华夏”（sino-centrism）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与在中国之内占享不平等的特权利益，乃成为国民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所要彻底根除的工作。

在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之前偏重“反满”，民国成立之初曾有五族共和的主张，“二次革命”到民国6年之间也曾有“联日反袁”的构想，但在“五四运动”时期，鉴于民族自决原则的传播，巴黎和会之失败和日本恣意的侵略主义，促使他重构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谴责日本侵略，支持韩国独立，以及提倡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主张。^②而台湾的抗日与革命事业，也是中山先生始终关心的课题。

由于中山先生遍游海内外，对世界局势与台湾的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革命同志林森、章太炎、吴铁城、邹鲁等也曾先后到访台湾。革命的刊物《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国民日报》、《黄帝魂》、《浙江潮》、《民报》都曾刊载有关台湾的记述。^③而他调派同志来台发展革命组织，并曾三次亲莅台湾策划革命与倒袁事业，可见其对台湾地位的关心与对台湾革命志士的倚重。只是民初中国政局混乱，以孙先生为首的国民革命势力仍仅局限于南方一隅，除了精神感召，能够提供抗日运动的协助诚极有限。但台海两岸人民在各自面对艰困的环境中，本于血缘种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反而愈见坚定。戴季陶于1927年2月5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演讲《孙中山与台湾》，转述孙先生在病重之际（逝世前20天）对他谈到有关日本的二三事中，极重要地指出：“我们总理虽在病中，仍旧爱顾台

① 《同盟会革命方略》，《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33页。

② 参阅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第126~157页。

③ 陈哲三：《中国革命史论及史料》，（台）商务印书馆，1987，第191~241页。

湾的同志，注意台湾同胞的革命策略。”^①实际上台湾的抗日运动，无论武装运动或1920年代以后的非武装抗日形式，始终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抗日运动，有着桴鼓相应的联系。

(二) 孙中山对台湾的部署及三次访台

1. 陈少白先期来台拓展革命组织

国民革命的有形组织“兴中会”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之后，其第一及第二个支会分别于1895及1896年分设于横滨及南非。^②第三个支会即“兴中会台湾分会”则为1897年11月，陈少白来台所拓展的革命组织。据陈少白口述：

孙先生从伦敦脱险出来，离开英国，经美国、加拿大，乘皇后号来日本，到横滨登岸，天还没有亮，他到我家里来……我说：我俩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机会，到台湾去一次……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可以把那里的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孙先生深以为然。^③

兴中会台湾分会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的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组织的开始。到了第二年（1898）3月陈少白第二次来台拓展会务工作，募得革命经费两三千元。由于台湾同志踊跃捐输，加上兴中会台湾分会相关同志的支持，乃促成中山先生于1900年选择以台湾为策动惠州起义的基地。^④

① 戴季陶演讲《孙中山与台湾》，原载《台湾先锋》第1期，（1927年4月1日）。参阅杨碧川《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史》，（台）稻香出版社，1996，再版，第98～100页；及张瑞成编辑《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9，第262～264页。

②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一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94，第73页。

③ 许师慎：《陈少白成立兴中会之会于台北》，《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5辑，（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1976，第223～230页。

④ 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台）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第8～9页。另参阅《国父孙先生与台湾》，第50～79页；陈占勤编《陈少白先生年谱》（初稿），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1991，第39～44页；林惠国主编《陈少白的故事》，花城出版社，1995，第75～90页。

2. 孙中山到访台湾的经过

有关孙中山先生来台事宜，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原党史委员会）由库藏史料及其从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之编辑数据，应以三次来台较可靠。^① 其行程纪要如下。

（1）第一次于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危及清廷的朝政与治安之际，中山先生视为有机发动革命，乃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商议，决议领导兴中会同志在惠州起义。并于9月25日（阴历闰八月二日），化名“吴仲”自神户乘“台南丸”轮经马关到台湾，日本友人清藤幸七郎随行，28日由基隆到台北。

当时台湾总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因在东京与中山先生晤面过，允诺相助中国革命。此次兒玉在台湾迎接中山先生，同意给予武器援助。中山先生抵台北后，设革命指挥部于台北新起町（现为长沙街）筹备军需。据中山先生自述：“不意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易动由伊藤博文出任，新任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止武器出口及禁止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结果惠州之役因后继无援而失败，中山先生闻讯乃于11月10日乘“横滨丸”轮自基隆转赴日本。合计其在台停留44天，主要接洽之台湾革命志士为杨心如、吴文秀等人。^②

事实上这次事件早在日本政府的算计之中，原因是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变危机，日方认为有机可乘，希望厦门混乱出事，进而出兵占领，建立在华南的桥头堡。亦即以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为幌子，实际则是政治的诈术，最后因列强干预，日本内阁换班，政策上转而禁止援助。^③

（2）第二次来台是在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戕害宋教仁，擅借巨款，违法专权，引发各省讨袁之役挫败之后，中山先生欲赴广州，船到福

① 《国父孙先生与台湾》，第119～146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13页。有关中山先生第一次到台湾策划惠州起义事宜，据《国父年谱》，（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5，第146页。编列同行之日本友人包括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平山周、尾崎行昌等人。唯据陈鹏仁教授考证，当时实际上仅清藤幸七郎这位日本友人随中山先生等人到台湾。参阅氏著《中国国民党在日本》，（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第60～65页；《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台）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第138页。

③ 许介麟：《台湾史记：日本殖民统治篇2》，（台）文英堂出版社，2007，第107～121页。

州，但局势危厄，不得久留，乃偕胡汉民搭“抚顺丸”轮秘往台湾。孙先生化名王康贤，胡汉民化名张立民，于8月5日抵基隆。由于日警接获训令不欢迎走避前来的中国革命领袖，台湾总督特派宪警三人接待住进台北御成町之“梅屋敷”。也因日警在外戒护甚严，后在店主大和宗吉之宗兄藤井悟一郎的记录中，中山先生始终温和微笑，甚少言语，饭后挥毫“同仁”、“博爱”二幅字敬送店主人。只好在8月9日改搭“伊豫丸”轮转往神户。^①

(3) 第三次是在1918年，因国会擅行改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山先生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离开广州，原欲取道打狗（高雄）再往日本。嗣经香港报纸披露，为安全计乃于6月1日由广州到汕头乘“苏州丸”赴台湾，隔日抵基隆。随行包括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目的是和台湾的革命同志会面宣传主义与做法，但因日警阻挠随即改搭“信浓丸”轮离台赴日。^②

（三）孙中山三次访台的交往关系

1. 杨心如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杨心如，任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乙未失败，经商台湾，陈少白于丁酉（1897）到台湾颇得其助。”又称：“以同志杨心如之介绍，收揽兴中会会员即台湾侨商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数人。”^③ 实际上杨心如（1868～1946），小名帝镜，本是广东翠亨人，兴中会会员杨鹤龄族弟，为孙中山的年轻旧识，常与谈国家兴亡，当时在澳门、中山、香港、台湾诸地奔走，策动力、物力响应革命。曾参与广州起义、惠州之义，是一个“毁家纾难，产业十九捐助革命，家遂中落”的革命志士，后人把杨心如与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并称为“翠亨村四杰”。

①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来台事迹，据《国父年谱》（上册，页591）所述，系搭“信浓丸”前往神户。另据陈鹏仁教授引萱野长知之说实系改搭“伊豫丸”邮轮转赴日本。参阅氏著《国父在日本》，（台）商务印书馆，1988，第13页。

② 有关孙中山先生第三次到台湾之事迹，据《国父年谱》（下册，第816页）称先生搭“苏州丸”抵台，日本官宪即到船上护送其到台北，翌晨改往日本。但据陈鹏仁教授转述，当时任职台湾总督府秘书官的石井光次郎回忆，由于日方阻挠，中山先生并未上岸即改搭“信浓丸”赴日。参阅《石井光次郎与台湾》，2002年12月28日（台）《中央日报》；《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陈鹏仁译，（台）水牛出版社，1990，第111～112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台）商务印书馆，1969，第213、39～40页。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杨心如转赴台北，在经营茶叶的良德洋行担任司账，孙中山委派陈少白于1897年7月到台湾发展组织，自然而然透过杨心如的介绍与帮助。而吴文秀是英商良德杨行买办，赵满朝任职嘉士洋行，同年11月就以大道埕杨家为会所，成立兴中会台湾分会。^①

近年来探讨孙中山在台行迹的资料备受重视，马英九先生曾对新闻界谈到鼓励筹拍“国父传”，以彰显孙中山与台湾的精彩历史。并介绍吴文秀与孙中山交往的典故，描述“孙先生原本到台湾找杨心如，希望杨介绍台湾轶事，碰到吴文秀后一见如故。孙先生一口广东国语，吴文秀讲闽南话，两人几乎没有办法沟通，后来开始讲英文，沟通非常好……这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应该流传下来”。^②

也有人说孙先生第一次莅台期间，曾出现在永乐戏院后面的一间洋人俱乐部的撞球场上，此处离吴宅不过百米，当年来台策划惠州起义，必曾在这位兴中会台籍会员的家做客。^③比较可信的数据是参加革命党的杨心如、吴文秀同样都住在当时华人聚集，交通方便，商业活动较热络的大稻埕地区，而杨家才是孙先生原就认得的旧识。

2. 吴文秀

吴文秀号眉甫，生于1873年12月27日，祖籍泉州，先人于嘉庆年间移住于淡水河畔，累世经营，颇有储蓄，至其父经营茶行，输茶叶至厦门，业绩甚佳。他继承父业再加发展，成为巨富。又擅长英语，与洋行交易或贸易输出，得心应手，他的里居处为“台北厅大加纳堡大稻埕建昌街三番户”。

他于1897年荣膺茶商公会会长。曾代表台湾茶商，前往欧陆参加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欲推广台湾茶进入欧洲市场，然因“洋行”把持，而未竟全功，他顺道考察欧美商务，并携回改良制茶方法，对台湾茶叶产销贡献极大，1900年还得到台湾总督府授佩绅章。据《台湾民报》，当年孙中山抵台，策动指挥惠州起义，吴文秀“与他周旋，无微不到”。而且还捐献革命经费，以助筹办《中国日报》。吴文秀经营茶叶成绩斐然，而后多角经营，投资于制樟脑、开金矿及创立制酒公司，但是却一一失利，乃辞退一切职务，但得盲肠炎，于1929年病逝，享年57岁。孙中山莅台遗迹，被提及多

① 广东翠亨中山故居孙中山纪念馆网站：www.sunyat-sen.org：1980/b5/www.sunyat-sen.org/cuiheng/show3，2010.04.12。

② 《筹拍国父传，马总统讲古》，2010年1月29日（台）《联合报》要文A4版。

③ 庄永明：《台北老街》，（台）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第62~63页。

处，位于今贵德街曾是兴中会台湾支会聚会所的“吴宅”，实应被重视。^①

3. 其他

对兴中会台湾分会成员与活动的探讨，主要根据陈少白先生的转述。陈先生1897年到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把那里的中国人连络起来”。当时透过杨心如的介绍认识了良德洋行东家吴文秀。又由吴、杨的介绍认识、广东大商赵满朝、容祺年。以往学者研究的数据中所见的简略资料是，赵满朝为祖籍广东之台北人；容祺年祖籍广东潮州，光绪二年（1876）随父渡台，19岁担任正协隆洋行书记，21岁升为买办，28岁转任英商义和洋行买办，输出茶叶到厦门，为人机敏干练，嗣任仁济院院长，对革命经费多所赞助。后来容祺年在台北创立华民会馆。^② 这些是兴中会台湾分会最早的成员，1900年代都居住在台北建昌街一带，也是最有可能与孙中山1900年旅台接洽来往的人士。

此外据传孙中山第二次来台期间曾有下列活动。

（1）曾任台北县议员陈义芬说：“国父一度住在台北市石桥仔头（今延平北路二段）陈高兰家，四次接见其父陈捷升及祖父陈秋菊”。

（2）曾与友人在顶北投樱川阁旅社休息一周。

（3）也曾在新北投公共浴场沐浴并进食等传闻。^③

但考证史实，以1900年孙中山二次来台，在日警严密监控之下，入住梅屋敷之外，根本难有后人误植的诸多传述。^④

四 杨心如先生行谊纪要

（一）家世简历

在日据时期台北户籍资料中，登载杨心如，明治元年（1868）3月2日生，原籍“清国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乡”，父杨作霖，母杨黎金爱。

① 池宗宪：《贵德街史》，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2003，第134～138页。另参考庄永明《台湾纪事》，（台）时报文化出版社，1989；中央广播电台网站：<http://www.rti.org.tw/Taiwan/TaiwanHistory.aspx?id=94&Month=10>，2010.4.12。

② 同注①，第42～43页。

③ 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台）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第11～12页。另参阅黄纯青《国父与台湾》，（台）台湾省文献会，1976。

④ 黄季陆：《台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及有关资料》，《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五），（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1976，第207～276页。

职业茶商、书记、制药业。种族登列“清”，种别列“二”。妻程桂僊，明治5年（1872）11月20日生。住所从台北厅大加蚋堡大稻埕六馆街2丁目28番户寄留，改为永乐町353番定寄留。^①

杨心如与原配大房程夫人，育有四男（杨东瀛、杨东海、杨东福、杨东星）三女（杨寿龄、杨寿松、杨寿菊）。之后再娶二房台北市人林足夫人，培育五男（东华、东国、东英、东雄、东震）四女（萍凉、根树、寿兰、寿柏、寿梅），家族后裔分散海峡两岸。

有关杨如如在台湾从事的本职业务，后人的追溯是1895年第一次广州之役失败，为了逃避清廷缉捕，来台依其在台经营茶商的族亲。随后在台北永乐町（今迪化街）良德洋行任司账，并兼理檀香山华侨在台经营的华利洋行和美商美时洋行账务。当时良德洋行东主及代理华利洋行、美时洋行的买办是厦门人吴文秀。两人相识，对革命的看法一致，因此1897年陈少白来台，经杨心如的介绍安排，认识吴文秀及广东香山人容祺年、赵满朝，以及新竹人林震东等共同加入尚在保密阶段的兴中会台湾分会。^② 由于杨如如在台多年从事贸易的实务经历，在华人社群应有相当的人脉关系，并且受到推崇。在昭和11年（1936）台北中华会馆第12届职员就职典礼上，还膺选荣任监察委员。《台湾日日新报》曾刊载就职典礼上，会员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党旗及孙总理遗像行礼，恭读孙总理遗嘱，并做捐款的事实报道。^③

（二）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

据国史馆典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国民政府褒扬杨心如案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第47次常会决议褒扬杨心如同志。在《杨心如先生事略》中纪述：“先生字帝镜，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人，少与国父孙先生同里。好读书，有大志……独服膺国父主张，与陈少白、杨鹤龄、杨其云、陆皓东诸先烈等次第入盟。……革命。更奉国父命，奔走香山、澳门、香港、台湾各处，策动响应，几经险阻，数濒危殆而皆无役弗与。故辛亥光复后，中山县城街名改先生之名，亦与国父及皓东先生并列。……第一次广州之役失利，先生随国父来台，与当地志士相结纳，策

① 杨富冠先生（杨心如之孙）提供《杨心如据户籍誊本数据》，2008年5月30日录件1页。

② 梁寒操：《扩建会所在纪念先贤配合国策》，《广东同乡会特刊》，（台）广东同乡会，1974。

③ 昭和11年（1936）1月6日《台湾日日新报》第8面；以及1月8日《台湾日日新报》第4面。

划近海革命据地。时台湾初陷，倭人监防甚严，先生随护左右，与国父共饮食，同寝处者凡数阅月。”^①

在杨家子嗣的记忆中，杨心如在台湾从不过生日。原因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好友陆皓东及先生在大陆的岳父（元配程夫人的父亲）壮烈牺牲，先生在其生日那天面临清兵到处在扫荡革命党人，他差一点就被抓到，之后逃到台湾做茶行贸易工作。但是日据时期殖民地的特殊环境，身寄虎口险恶环境下，为避免家族受到牵连，平时绝口不提以往的工作，也不多谈与孙中山、陈少白或家乡的事情。

后人理解曾经有过的是1929年国父奉安于南京，杨心如想要赴南京谒陵，但遭到日人阻止。从而居常抑郁，独居危坐，不太与家人交谈，只是常仰天呼咄而已。^②

（三）战后陨落的一代元老

1945年日本战败国土重光，台湾随后光复。1946年3月，杨心如感怀战后情况，曾致函在重庆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孙科闻讯特书复函致意。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陈仪也曾特别接见，并致函送奉礼金表达敬仰之意，这件事曾在当时的新闻报纸公开登载。

1946年10月4日杨老先生在台北逝世，享年79岁，告别式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国民政府于1947年2月7日明令褒扬，并由国史馆立传留传。1985年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曾在杨家原先旧址，永乐町一丁目二十四番地，即台北市塔城街五十巷十二号所在地，竖立一座大理石“兴中会台湾分会旧址”纪念碑。大约在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前后悄然消失，也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五 结语

1911年辛亥革命硝烟消逝已达百年，对其是非成败的解说，百年来

^① 《杨心如先生事略》，（台）“国史馆”馆藏史料文物查询系统，有关《革命先进褒恤案》（十一），典藏号：001-036000-0098号。

^② 冒鹤亭：《第一位到湾的兴中会会员——杨帝镜》，原载《国史馆馆刊》1卷3号，（南京，1948年8月）。另参阅《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台）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9，第49~50页。

海峡两岸的学术与政坛犹是各自表述，莫衷一是。但是对于孙中山的救国理念，念兹在兹，奋斗不懈的精神，在当代两岸人民，以及广泛的海外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中，普遍感同身受，有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共创美好的想象。原因主要是来自文化性的民族情感，以及曾经相同面对的历史苦难。

考察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处境，孙中山之于日本，有着利用与被利用的矛盾对立。毫无疑问孙中山拟借台湾的资源强化国民革命的力量，但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不断激起台湾知识菁英持续反殖民、争人权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抗争，殷切期盼民族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之中，兴中会分会的筹组以及后来革命理念的扩散，对于汉民族意识的传承，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杨心如的事迹就是默默地扮演着此一联结的角色。

历史的吊诡与无奈，使杨氏在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对祖国革命的用心不敢声张。他的子嗣在战后台湾经历的“二二八事件”，作为外省籍第二代，也是避谈过去，避免惹祸上身。至于居留大陆的家属，也因为国民党元老之后，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更是戒慎恐惧，唯恐不测，许多值得留存的家族文物因而佚散。面对过去，展望未来，杨心如在台湾的事迹研究，在两岸之间仍值得积极地加强开拓。

作者单位、职务：台北国父纪念馆文教组主任